

ICS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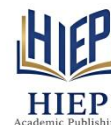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1, 2025, pp.135-141.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13>



现代小说的传播：情感叙事与公私领域的协商 ——评金雯《情感时代：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

郭 然 (Guo Ran)¹

摘要：启蒙理性与现代小说的兴起是国内外 18 世纪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的经典命题，前者已近乎不刊之论，后者由于相关研究过多难有新意也让人望而却步，2024 年《情感时代：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高举“情感”大旗为上述领域的深入垦拓又添一部见解独到的力作。《情感时代》对小说兴起的回应是通过从媒介传播的角度切入 18 世纪情感问题实现的，该著作的贡献在于：学者金雯从纷繁的现代小说研究范式开辟出一条“情感叙事”的新路，在重构启蒙思想内部理论框架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小说的传播如何连接当时的私人和公共领域，并在与各种历史话语的斡旋中干预现实。《情感时代》的出版不仅弥补了国内学界缺乏系统研究文学情感问题的不足，也为进入 18 世纪文学场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媒介视角。

关键词：《情感时代》；小说传播；情感叙事；公私领域

作者简介：郭然 (Guo Ran)，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18 世纪英国文学文化。电邮：gr2013gjy@163.com。

Title: The Dissemination of Modern Novel: Affective Narratives and the Negotia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A Review of Jin Wen's *Age of Feeling: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ovel in the 18th Century*

Abstract: The rise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the modern novel is a classic theme in the study of 18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former has become almost an indisputable theory, while the latter, due to an overwhelming amount of related research,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find new perspectives, deterring further exploration. In 2024, *Age of Feeling: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ovel in 18th Century* boldly raised the banner of “sentiment”, adding a uniquely insightful work t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se fields. *Age of Feeling*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the novel by addressing

18th century issues of senti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dissemina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work lies in the fact that scholar Jin Wen has carved out a new path of “affective narrative” from the complex paradigms of modern novel studies. While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in Enlightenment thoughts, the work emphasizes how the dissemination of novels connected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of the time and intervened in reality through negotiations with various historical discourses. The publication of *Age of Feeling* not only fills the gap in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literary sentiment in domestic academia but also provides a fresh media perspective for entering the literary field of the 18th century.

Keywords: *Age of Feeling*; Dissemination of Novel; Affective Narratives;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s

Author Biography: Guo Ran, Lecture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18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gr2013gjy@163.com.

2024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金雯教授的发轫之作《情感时代：18 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以下简称《情感时代》）。在国内众多 18 世纪文学研究和翻译论著中，该书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新颖的论断发出了与传统文学常识完全相左的“异声”。主标题“情感时代”统领、贯穿并挑战了副标题 18 世纪文学研究中两个最为经典的问题：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其一，国内外学界惯将 18 世纪称为“启蒙时代”，康德（Immanuel Kant）（2017，p.23）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换言之，启蒙的核心是发现主体内部的理性，进而自主使用理性建构有关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知识，因此“启蒙时代”又被称为“理性时代”。在金雯抛出“情感时代”之前，这一观念在国内几乎从未受到公开且系统的质疑。其二，18 世纪还是西方现代小说诞生的关键时期，从伊恩·瓦特（Ian Watt）到麦基恩（Michael McKeon）的学术传统不断在夯实真实论、道德论的权威地位，情感说的提出则在打破学术范式宰制的同时为重新审视该问题吹进了思想新风。上述两点“发难”不仅激发了读者阅读《情感时代》的兴趣，正如刘意青教授所言，这部“首次全面研究启蒙‘情感’这一重要议题的专著”如何系统引入“情感”研究范式、实践文学情感的文本细读以及最终令人信服的导向标题中雄心勃勃的结论等等方法论问题同样使读者延颈举踵。

至于如何将情感与现代小说、启蒙思想糅合，金雯（2024，p.385）在著作中通过细密地论证给出了答案：“感官活动引动人类情感，体现人的内在性和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能以感官为媒介进一步延展自身，并结合反思的方式勾连起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构建总体性知识”。作者认为，18 世纪欧洲社会的各种历史话语表明，人类在自我内向挖掘中发现的除了理性还有情感，甚至后者在对外部世界的建构中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身体感于外物而产生情感，情感又作为媒介引导人类进行活动回应或改造外部世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纸媒变革风行的小说及其阅读行为成了激发、塑造人类情感的重要媒介，通过展演人类情感的运作方式，小说阅读隐微地改变着欧洲社会。对于 18 世纪的小说家而言，文本中的情感再现如同社会文化的晴雨表和调试器，通过写作经由私人阅读改变个体情感和行为结构，从而寄予小说重塑公共领域中人际关系的厚望。

一、作为媒介的情感

对情感的关注源自近二十年来学界内部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人文学者对这条理论脉络的重构上溯至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情动”理论。“情感是什么？”是首当其冲需要回答的问题，但对初次接触情感理论的读者而言难免有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因为言说或意识到深陷某种情感状态——忧郁、愤怒、恐惧明显比思考情感的本质更加轻易。这种现实境况折射出了情感研究的关键点和难点：被情感

裹挟的主体为何在意识到自身状态时却无法总是成功调动理性实现自主？事后主体如何凭借理性剖析情感？无论答案是什么，上述提问都指明存在理性面对情感失效的时刻，进而将两者推向对立的局面。当然，金雯著作想要实现的“时代更迭”并非是以情感击溃理性，而是在主体认识过程中申明情感的功用，揭示理性难免掣肘的状况。

18 世纪欧洲内部的情感术语纷繁复杂，陆扬（2017，p.30）曾使用情感的“复数”来形容这一局面。“复数”一方面反映了理性尝试收编情感的阶段性胜利，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情感的丰富不断溢出前者的分类。在 18 世纪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中，被用来描绘情感的词语包括 *passion*, *affection*, *emotion*, *feeling*, *sensibility*, *sentiment* 等等，它们所涉及的情感并不完全重叠。《情感时代》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区分：*passion* 与 *affection* 虽然都被用来形容激烈的情感，但前者强调受制于物质性身体经验的情感，后者则倾向于意志和知性；*emotion* 表示能够引发行为的情感，且不具有褒贬色彩；*feeling* 侧重情感与感官、灵魂与身体的相通；*sensibility* 主要指身体感知与大脑交接之后人的主观反应。总体来说，18 世纪情感的内涵主要围绕身体——头脑/内心/灵魂这两极展开。

金雯在其著作中将情感视为身心联合的表征。就笛卡尔而言，身体感知外物而产生激情，激情通过血液和动物精气传达至大脑腺体，灵魂对激情进行处理最终形成观念。这套情感可被认知的乐观推测导向了完整独立的主体性，人感知、分析情感，并生产观念不断揭示外部世界。换言之，在人实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中遵循着世界——身体——情感——灵魂——认知——观念这条知识生产路径，此过程中将具身经验转变成思想观念的关键媒介是情感。在斯宾诺莎的身心一元论中，身体引发的情感直接推动观念的形成，他“认为心灵与其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情感——或身体强度的触动——直接通向灵魂，情感即为对身体强度变化的直观感知”（金雯，2024，p.72）。与此并行的还有作者对情感深不可测晦暗面的提醒，它潜伏着随时可能切断主体与世界的联系。《情感时代》将其称为“不可名状的情感”，与“情动”合流涌向启蒙理性无法照亮的部分，成为主体深处的他者。这类在 18 世纪科学话语中无法被合理解释的颠覆性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却成为可被解码的时代症候。

不仅如此，《情感时代》还在 17 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人类情感的纷繁认知中梳理出善恶两条支脉，在对人类情感抱以乐观想象的认同时，肯定了情感直观的伦理价值。当时欧洲内部盛行的人类起源推测史大多认同主体最为本质的激情是自我保存，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这种情感将无可置疑地把人际关系引向战争状态，但孔迪拉克（Etienne Condillac）、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等人则相信与自然法相伴而生的是人会对给他人利益造成侵害的行为产生自我憎恶的反应，从而证明一种社会性情感的存在。换句话说，人的天性倾向于选择导向善的行为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愉悦，避免恶行会引发的负面情感。但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恶行与私人社会情感之间边界的暧昧使得孔迪拉克这类启蒙思想家对情感的认知近似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除了接受别无他法。但这一认知确乎在 18 世纪将情感与道德直接关联，或者说情感同时成为道德判断的媒介和结果。

金雯的洞见在于将情感的二元性贯彻到主体内部与人际交往之中，揭示现代性诞生之初就存在且挥之不去的悖论，深化着对情感的认知。首先，情感是人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媒介，直观情感和“不可名状的情感”共同构成了主体行动的依据，但后者随时可将主体抛入失控状态，这种危机至今存在；其次，当人与世界的关系聚焦到主体间性时，情感导致的主体失序会引发系列蝴蝶效应，也为社会公共生活的混乱埋下了种子。即便沙夫茨伯里（1999，p.48）在《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中延续了他对情感道德倾向的自信，对人类具有的“共通感”详尽阐发——“对公共福祉和共同利益的感觉，对社群或社会的爱，自然的温情，人性化，服务精神，以及生发于对人类共同权利和同一物种个体间自然平等的正当看法的礼节”，勾画出一个由温情、无私、利他情感主导的主体间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但 18 世纪欧洲内部连番上演的党争、阴谋、犯罪、诱拐、情欲、奴隶制等现实状况无一不在证明人性滑向另一面的轻易。然而，利己情感的泛滥并不意味着情感作为调节社会状况之中介完全失

效，反而确证了情感教育的不可或缺性与关键性。情感是需要引导和培育的，问题在于这种情感教育凭何实现，这是 18 世纪的思想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情感时代》论述的对象——现代小说显然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二、小说的传播

萨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情感时代》专门设置一个章节讨论的对象。其成名作《帕梅拉，或美德有报》（*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以书信体写成，初衷是教导青年女子掌握以书信表达情感的诸种礼仪和规范，但小说的传播也对其目标读者进行了多次情感教育。通过展现年轻女仆的情感实践，理查逊揭示了情感的道德性内涵和经济价值。然而，坚持拒绝主人诱惑最终获得真爱和地位跃升的情感经历同时又使不少出身微贱的女读者向往帕梅拉的结局，因此主动在现实生活中引诱自己的主人。为此理查逊在《帕梅拉续集》（*Pamela II*）中专门设置了已成为太太的女主人公劝诫女仆安守本分的情节。（刘意青，2006，p.183）《帕梅拉》的出版和阅读充分说明了小说在塑造读者情感模式和引导、矫正人类行为所能起到的作用，而 18 世纪又被称为现代小说诞生的时期，后者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欧洲公众的情感生活从而塑造社会稳固所需的情感交际范式是《情感时代》展开论述的基础环节。

该书的标题虽然涉及“现代小说的兴起”这一经典问题，但金雯展开论述的重心却与之前的学者存在差异，《情感时代》更关注小说的阅读传播效应。有关小说兴起的研究多围绕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认识论难题展开，如印刷术、出版制度的完善、读者群体的激增、世俗观念与宗教观念的协商等等，但小说传播以该类研究的丰硕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探究读者阅读行为的社会化功能，所以在金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她对书籍史这类前沿理论的主动借鉴。“书籍史就是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印刷术的传播功能，目的是认识思想观念如何借助印刷得到传播，印刷又是如何影响人类思想和行为”（戴联斌，2017，p.14）。就金雯而言问题就是对情感现象的探讨是否借助小说得以表达？小说的传播对读者情感结构是否产生影响？

在此之前，18 世纪欧洲的小说阅读是否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比小说是否表现了情感更亟待论证，即金雯所说小说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情感时代》耙梳了大量阅读史史料，从“小说”术语的使用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还原当时小说的流传广度。首先，虽然 1740 年以前“小说”（novel）一词使用较少，更多是“回忆录”（memories）、“生活”（life）、“历险”（adventures）、“历史”（history）、“秘史”（secret history）、“罗曼司”（romance）等，但“虚构真实”已成为这类叙事故事的重要创作原则；1780 年前后，小说注重当代生活题材的写实旨趣已然成型，“小说”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作为标题出现在叙事作品封面（Raven, 2000, p.16），说明小说的广泛阅读与传播已经实现现代阅读观在读者心中的接受和塑成。其次，各种 18 世纪不列颠虚构叙事作品清单和目录所展示的图书馆借阅记录、图书征订用户名册、印刷规范变迁等都揭示了叙事作品的印数、读者均在逐年递增；不仅如此，报刊与流通图书馆也为当时各阶层接触小说提供了更多的路径。“这种种信息都可以说明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小说的传播力度和社会地位有所提升”。（金雯，2024，p.199）

《情感时代》还专门将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项狄传》的成功视作小说根植于大众通俗文化土壤的典型案例。在将通俗文化大致分为乡村口头文化（如劳作歌、民谣、戏剧、传说等）、城市市民娱乐活动（如闹剧、各种演艺秀等）和随着出版业发展催生的部分纸媒文化（如笑话集、布道词、政论文、罗曼司等）后，金雯致力于否定伯克（Peter Burke）区隔 18 世纪通俗与高雅文化的努力，指出精英阶层始终在积极参与通俗文化的发掘与传播，以此反哺后者。小说作为一种新生成的文体就扮演着这一媒介功能。首先，《项狄传》以文雅的机智讲述色情笑话就体现了 18 世纪“高”“低”文化的融合态势，以至于当时就有读者指出其他作家在创作时也可以“将放荡的暗示和双关语和自己作品中有关道德和功用的那部分糅合在一起，吸引那些原本不会读这本书的读者”。（Anderson, 1980, p.474）例如，

读者如果没有读过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剖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就无法理解《项狄传》第七章“樟脑处理过的打蜡布”与抑制性行为的关联。其次，在识字率远未普及的 18 世纪，《项狄传》向视觉文化借鉴同样反应出小说家争取更多读者的努力。因为相比门槛较高的私人化沉浸式阅读，家庭围坐朗诵的方式显然更容易突破以往观看戏剧的时间地点限制成为民众新的消遣方式，如何最大程度降低阅读的陌生化为自身赢得更多受众，小说自然需要向传统民众喜闻乐道的通俗戏剧表演方式借鉴。于是《项狄传》中不仅存在大量对人物肢体动作的描写，斯特恩甚至专门邀请同时代的著名版画家霍加斯（William Hogarth）为其小说中的经典场景配图。虽然学界对 18 世纪小说与戏剧的互渗已有论述，但从读者接受和小说传播的视角来审视两者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开展。¹

最后，当读者面对摆放在眼前的小说时，那些排版成行的文字如何能够作用于他们呢？虽然金雯在著作第四章“书写‘真实内心’的悖论：18 世纪情感文化与现代小说的兴起”中直面了该问题，但《情感时代》的回答已与“小说如何兴起”的既有论述大相径庭。金雯给出的答案是“虚构真实”，这是她在自觉回应前人研究成果同时合理突破既往范式后得出的颇具独创性的真知灼见。“虚构真实”“与作者、读者之间逐渐达成的默契密切相关。现代小说不仅是具有再现‘真实’功能的虚构叙事体裁，更是一种崭新的、强调‘相关性’（relevance）的交流模式。”（金雯，2024，p.175）所谓“交流模式”显然是在修正伊恩·瓦特的观点，在“虚构真实”的视域下，小说不再是形式上与实证性真实保持高度一致的机械模型，也不仅是一套通过人物名称、时间、地点、事件再现当代生活的叙事方法，而是通过想象，将虚构叙事与自身经验相关联进行移情同时也是体验的意愿。换句话说，“虚构真实”是一种内心体验而非通过叙事模仿再现外部现实世界。回到本节的开头来看，《帕梅拉》不仅是为了让读者相信小说讲述的故事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发生了，而且还要让读者自觉移情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做出恪守美德或采取行动试图跨越社会阶层。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在 18 世纪努力靠近民众并取得成功的可能，以及它所具有的干预现实的潜能。

三、情感叙事的研究意义

如果 18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将情感看作沟通人与客观世界及其他主体的媒介，现代小说恰逢其时的诞生并将描写情感视作己任，那么读者群体对这些情感叙事的阅读有何意义？《情感时代》时刻提醒我们 18 世纪是现代媒介变革的重大时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99）也曾指出此时新闻报刊小说等新型纸媒的传播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地位，所以受众颇广的小说阅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社会文化事件。《帕梅拉》所引发的社会热议以及围绕该小说衍生出的各类周边，在 21 世纪的读者看来并不陌生，与数字时代的热搜话题与文创产品本质上也无差别。可见，尽管小说承载信息的方式与智能手机不同，但受众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形成共识的协商本质并未改变。小说通过展演虚构人物的情感实践，得以将 18 世纪的读者卷入这块叠合阅读与生活的场域，在反馈与议论中将私人化行为引向公共空间：以小说人物的遭遇为镜鉴，私人情感如何调节自身以避免与他者形成冲突，在保全自我的同时实现对普遍社会规范的协商。《情感时代》看似是在处理 200 年前现代性诞生之初的公私悖论，实际上“今日中国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情志如何与团体身份彼此协调的问题，应对这个挑战，理解主体性的吊诡及其情感表征是首要前提”（金雯，2024，p.383）。可以看到，金雯的情感研究决不是束之高阁的孤芳自赏，相反始终透露着对现实生存困境的关照、思考并尝试给出可能的启示或解决方法。

私人情感问题如何经由小说阅读与公众生活产生关联？金雯提出以情感为核心的“内心”观对哈贝马斯并未言说透彻的阅读过程进行了细致开拓。哈贝马斯（1999，p.54）指出小说阅读是读者的私人现

¹ 任远（2021，38-46）曾指出 18 世纪小说的戏剧起源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小说对戏剧仿真理论的借鉴，二是小说的“真实”效果需要戏剧的视觉特征加强，三是小说对戏剧叙事技巧的借鉴。金雯（2024）在《情感时代》中对小说之戏剧性的论述是则是从身心关系的角度展开。

实经验与虚构小说经验的反复校对，“组成公众的私人就所读内容一同展开讨论，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中”。这种解释与笔者之前的讨论路径和结论均有相似之处，但私人导向公众的具体细节和过程却未言明。金雯以缜密的论述从现代“内心”观着手、以小说为场域形象剖解了无数私人阅读趋向普遍情感准则的过程。首先是对现代与传统“内心”观的区分，18世纪的“内心”是“观众导向的私人性”，“头脑被赋予了一种自主和自为的特性，内在于自身，独立于外部环境，可以认识自身，也可以驾驭外物”，以此“萌生了与外界对抗、富有独立性的主体观念”，主客二元关系依然形成。而文艺复兴之前的主体与内心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缺乏独立的概念，因此不存在对话之可能。（金雯，2024，pp.180-182）其次，小说阅读为现代“内心”/主体提供了交流的语境和对象：一方面，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及叙事者对话，袒露心声，另一方面，读者走入小说制造的各类“表演”场景与人物关系，“凸显‘内心’面对公众并受到他们制约和阐释的维度”（金雯，2024，p.185）。读者在凸显自身的同时也理解了主体的局限，明白跨越这种局限的凭借及可能性，带着这种认识投入现实生活。

《情感时代》在分析《克拉丽莎》中的隐私观时进一步推进了对公私关系的认知，尤其是其悖论性。金雯认为没有任何一种体裁可以比书信更具对话性，因此书信体小说最能体现读者与公众交流后的自我协商过程，而《克拉丽莎》正是一部由信件构成的现代小说。如果信件是私人内心的表达，那么阅读书信体小说则意味着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在这一情景中，不仅读者要对主人公的情感叙事进行个性化评判，还要针对小说中其他人物对主人公的态度重新审视自身。极易被忽略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和叙事者在面对潜在读者时，也会基于对隐私的保护选择性地叙事，修饰自我形象。这种担忧深刻地反映了公私之间的悖论：自我需要依靠向他人表白建构自身，但又因为畏惧他人的眼光无法全然吐露隐私。这在《克拉丽莎》中表现为她对自身被强暴经历的隐而不语。克拉丽莎不将她与勒夫莱斯的信件公之于众就无法自证道德的清白，但她又深知坦诚的自我表白无法获得公众的理解，于是在小说中说出了使人惻隐的无奈：“这些有利于我的申辩在法庭上并无优势（可能成为谈资，被人放肆耻笑），虽然在法庭之外，面对一个私密且严肃的听众，这些申辩会让勒夫莱斯罪无可赦。”（Richardson, 1985, p.1253）克拉丽莎自己深知她的悲剧本质上源自私人书信与公共领域之间发生的无法缓解的冲突，只有通过放弃生命才能实现自我在道德上的复活，让他人（包括读者）重新理解她的情感历程。金雯深知这种人性的吊诡源自人类情感的复杂，所以她能细读出克拉丽莎犹疑背后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什么能说，说了之后会引起什么反响，都是她反复考量的问题，她被迫在说与不说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金雯，2024，p.219），这句话写给克拉丽莎，也写给日常生活中在吐露私人情感与恐惧他人审视之间徘徊的当代人。克拉丽莎的忧虑和结局对于他们的启示可以导向不同的个人行为策略，进而切实改变着社会文化环境。

媒介与“无常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是《情感时代》引导读者反思的又一重大现代性问题。意识形态对语言的渗透已为现代人所警觉，但随着视觉化的图像叙事构成传播媒介的主体，传媒与情感的关系日趋复杂。经由图像引发的情感远比语言叙事更为去结构化或非理性化，前者有时只在瞬间完成判断。金雯在著作中分析了《项狄传》中特灵下士扔帽子的场景：

——“现在我们不是在这里吗，”下士继续说道，“而且我们不是”——（随手将帽子垂直扔在地上——停顿了一下，才说出下面这三个字眼）——“走了吗！就一会儿功夫？帽子落下时就好像一大块沉甸甸的泥团捏进帽顶里一样。”……——苏珊娜突然泪如雨下。

这段文字所描述的画面历来被研究者们引述分析，斯特恩本人也曾让霍加斯将这一场景绘制成插图。为什么观看特灵扔帽子的画面会让苏珊娜突然流泪？读者又如何应对这一情感涌现的瞬间？金雯将其归结为肢体动作所能对观众（小说人物苏珊娜）身体和心理产生的影响，并结合18世纪的“活力论”生理学指出自动无意识的物理反应与情感无中介的直接关联。换句话说，视觉导向的情感判断有时并无根由。当代人对这种情感的神秘发生既陌生又熟悉，对现代传媒生活中结局“翻转”的反复体验不断质疑着这

类情感判断的可信度。对于通过小说阅读/观看苏珊娜哭泣场景的当代读者而言，此画面依旧意义非凡，金雯告知我们：视觉化图像更具煽情性，因此当代读者更应该理性反思感官对于头脑的牵引力。

《情感时代》对情感问题的分析是多维和辩证的，读者不难捕捉到金雯与简单结论的距离。这一方面源自她对具体论述对象所牵涉问题复杂度的认知，这种认知又与她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学养有关，另一方面她又具备从复杂的话语网络中还原文学与历史、经济、政治、医学等对话的能力，最终将缜密的分析论证述诸文字。这本身对读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较高要求。不仅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18世纪欧洲文化语境并未限制住本书跨时空而来的现实关怀，《情感时代》从未打上学术著作俯视生活的高蹈姿态这一刻板印象。相反，它不断在启发读者发现和思考现代性诞生以来遗留至今的危机和困惑，人如何使用媒介这柄船桨的两面安全驶过情感的激流最终与他人一同抵达平静壮阔的海域。

总而言之，《情感时代》的出版弥补了国内学界较少系统研究文学情感问题的缺憾，也是金雯对自身学术生涯的一次高光总结。该书周旋于各种历史话语之间，为进入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也对跨学科研究如何展开进行了细致操演。这种对话性本身就是情感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自证，情感绝非日常的人性化宣泄，将自我画地为牢，而应是一条向他人敞开的媒介化路径，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应修习的课程。我们依靠情感与他人产生连接，在调试自我情感模式的同时建构和谐的公共生活。指出这种社会情感生活的可能，是《情感时代》也是金雯在落实学术抱负同时对现代人最诚挚的祝福。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戴联斌（2017）：《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第1版）。新星出版社。
- [Dai Lianbin (2017): *From History of Book to History of Read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ading* (First Published). New Star Press.]
- 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版），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
- [Habermas, Jürgen (199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First Published) (Cao Weidong, trans.). Xue Lin Press.]
- 金雯（2024）：《情感时代：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与现代小说的兴起》（第1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Jin Wen (2024). *Age of Feeling: Enlightenment Thoughts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Novel in the 18th Century* (First Published).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康德（2017）：《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版），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 [Kant, Immanuel (2017). *Collected Essays on the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First Published) (He Zhaowu, trans.). The Commercial Press.]
- 陆扬（2017）：“‘情感转向’的理论资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1）：30-38。
- [Lu Yang (2017). “On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Affective Turn’”.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01): 30-38.]
- 刘意青（2006）：《英国18世纪文学史》（第1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iu Yiqing (2006).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First Publish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任远（2021）：“在书页与舞台之间：——英国小说的戏剧起源”，《国外文学》（2）：38-46+157。
- [Ren Yuan (2021). “Shifting Between Page and Stage: The Theatrical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 *Foreign Literatures* (2): 38-46+157.]
- Editor, Anderson, Howard(ed) (1980). *Tristram Shandy: An Authoritative Text* (First Published). Norton.
- Cooper, Anthony Ashley,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1999).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First Published) Edited by Klein, Lawrence 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ven, James (2000). *The English Novel 1770-1829: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of Prose Fiction Published in the British Isles*, Volume 1: 1770-1799 (First Publish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Samuel (1985).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First Published). Penguin Books.